

# 学人本色 士人情怀

——钱端升的政治学学术与实践

钱元强\*

自唐朝初年中国建立了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以来，读书人都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成为“士农工商”社会中的“士人”。孔子提倡的“士志于道”就是希望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兴国安邦。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后，传统“士人”逐渐消失，而在新学及中西文化中有成就者，则被冠以“学人”的新称谓，“学人”和“士人”就是在不同阶段对学术与实践的侧重，赋予了“知行合一”新的注解。钱端升120年前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转换时代。

## 一、学人本色

### (一) 蓄志教书：“学者，吾唯一之希望也！”

1900年出生的钱端升8岁前在家读私塾，科举废除后，家族中聘任了一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塾师，使他眼界大开，1910年到上海敬业学堂就读，这个学堂由叶企孙<sup>①</sup>的父亲叶景沅任校长，为了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

\* 钱元强，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

①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转下页）

他又转到号称“中国伊顿”的上海南洋中学就读<sup>①</sup>，终于在1917年考入清华。晚年他回忆道：“我是在1917年选上了政治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的，接下来三十多年中，我是先学习政治学，后来教授政治学。1952年以后，我对政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断了。”<sup>②</sup> 钱端升的主要政治学成就基本上也是在这35年中取得的，如果不是1952年政治学被取消，或许他在后半生还能够撰写出一些更有学术价值的政治学专著，毕竟他那时正值壮年，学养和经验都处于峰值。作为一名专修政治学的学人，他21岁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给自己立下了“学者，吾唯一之希望也！”<sup>③</sup> 的志向。

正是这个志向，在往后的35年中，虽然国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侵略或战争状态，但他对学术的耕耘始终勤勉不辍，20年间他撰写了近十部专著，其中五部被列入大学丛书，还撰写了640余篇中英文文章，这些学术成就始终和国家的政治变迁密切相连。

1924年留学归国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教书。“我的一生与政治学有不解之缘。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作为我的主要课题。”<sup>④</sup> 所以他在西洋史、各国政治制度、行政制度、宪法史、比较宪法以及国际关系诸方面均有所长。1948年，他与周鲠生、萧公权一同被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三位归属人文组政治学科，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是“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sup>⑤</sup>。

钱端升不但自己一生耕耘学术，也鼓励有潜力的学生从事学术研究。

---

(接上页)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叶企孙长钱端升两岁，晚年钱端升在回忆叶企孙时说他俩是唯一的“三同”(即同在敬业学堂、清华学校和哈佛大学一起读书)。

- ① 上海市南洋中学创建于1896年，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被民国著名教育家吴稚晖誉为“中国之伊顿”，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级中学”。“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亚洲摄影之父”郎静山，文学泰斗巴金，“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和陶瓷学先驱”周仁等23位中外院士，秦汾、吴南轩、丁石孙等40余位高校校长，以及著名学者钱玄同等均曾就读于南洋中学。
- ② 钱端升：《开展研究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见中国政治学会《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编：《政治与政治科学》，群言出版社1981年版。
- ③ 这是钱端升写在自己1921年日记首页上的一句话，表达了他21岁时对自己未来事业的志向。
- ④ 钱端升：《自序》，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 ⑤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1945年春他对即将出国的何炳棣说：“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已打得比我们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sup>①</sup> 他一生非常爱惜“品学兼优”的学生。

## （二）翻译《英国史》：“研究国际政治，要深知各国历史”

钱端升在研究政治学时，历来重视对历史学的研究，尤其对近代西洋主要国家的历史特别关注。这和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所学各科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sup>②</sup> 有关。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后，他的教书生涯就是从讲授西洋史开始的，1926年他在清华开的课为“西洋近百年史”，同系的梁启超先生开的课是“历史研究法”<sup>③</sup>。钱端升认为“历史者，乃研究政治学之工具也。无历史知识，即不能会悟一时之政治现状，故不可不知之”<sup>④</sup>。

他相信英国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信条。研究政治学，历史学是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晚年钱端升在谈到政治学的研究时总结道：“研究国际政治，真正能够把握国际动态者，首先要深知各国历史，特别是欧美各国的历史。如果你不熟悉外国近百年的恩怨史，是很不容易把握国际政治动态的。”<sup>⑤</sup>

1929年秋，钱端升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史》，屈勒味林是1927年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钱端升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介绍英国种族的混合、民族的形成、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海权、国会的自由，以及海外膨胀、海外贵族政治，还有工业革命的初期、机器时代的海权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诠释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如何实现的。中国需要从强国的发展中看到未

①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②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③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④ 钱端升：《政治学》，《清华周刊》第366期，1926年1月1日。

⑤ 钱端升对其长子钱大都的口述，1988年记。

来，或许这就是他心目中最现实的政治。他研究历史时曾总结“所谓历史的方法本即比较的方法，所比较者涉及不过就是历史上的事实而已”<sup>①</sup>。他始终认为学“政治学不仅离不开法学，也同样离不开历史学、社会学”<sup>②</sup>。

1971年钱端升有一个学术计划，那时他刚从牛棚解放出来，计划先撰写一部100万字的《世界史》，其中包括绪论，以及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四编，下设三十二章，他已将提纲拟好，并分配了各编和各章的字数，他渴望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些学术工作。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周恩来总理委派乔冠华在赴纽约联合国大会前登门拜访钱端升，共同探讨中美双方资产解冻的法律事宜，当时国际形势已出现较大的转折，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时他决定完成一本专著来分析未来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走向，专著的书名为《论当今世界政治形势与经济关系》，规划和大纲都已拟好，其中包括世界的大势、美国、苏联、西欧、北美、大洋洲、日本、欧共体、第三世界、政治斗争、军备竞赛、资源问题、贸易与货币以及联合国等共分十二章，约25.2万字，可惜因当时的环境未能完成，只留下了规划和大纲。

### （三）编著《比较政治制度》：未完成的夙愿

钱端升在哈佛大学师从政府系的系主任何尔康（Arthur Norman Holcombe）教授，他当时是继哈佛校长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学科的领头羊。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主的比较政府研究》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钱端升对其中内阁制、委员会制和总统制的优劣都做了比较分析，也对立法、预算和监督的职能做了深入的探讨。比较政治制度为当时美国政治学的新方向，他后来将美国政府学和行政学及其研究方法也引进中国。

钱端升在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哈佛大学教

① Ch'ien, Tuan-sheng, *Preface, Modern Democracies, Four Political Classics Abstracted, Abridged and Annotated with a Preface in Chinese*,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1, p. VIII.

② 钱端升：《为我国的政治学发展进言》，《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

书期间，完成了《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及英文版《中国政府与政治》五部比较政府的专著。

1929年他曾计划出版一本汇集六大国家政治制度的书籍。<sup>①</sup>他首先完成了《法国的政府》，该书叙述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后，政体一直在君主和共和制之间摇摆，政治发展稳定性不如英国，主要原因是法国政治发展中分野巨大，中央行政权衰弱，议会效率低下。在1870年9月2日至1933年10月24日的63年内，共有85个内阁，总理有47人，内阁总人数超过1500人，其中甚至有人出任总理多达10次<sup>②</sup>。

他还完成了《德国的政府》，该书主要是叙述1919年《魏玛宪法》下的德国政府和政治生活，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很多，基础扎实，是他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但可惜的是出版前一年希特勒上台，废除了《魏玛宪法》，钱端升在出版时对每章结尾都追加一个补记。在这本书中，钱端升对德国的政党，尤其政党渊源和流变下的功夫最大。近代国家的政党流派及其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府的运作模式，因此他认为了解一国政治的前提是必须厘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

钱端升还计划撰写《美国的政府》《英国的政府》《日本的政府》和《苏联的政府》，最后将六国政府研究合集成《比较政治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未来中国政府的制度选择提供学术参考。但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学术计划被迫暂时中断，加之“二战”的爆发，他的学术方向转到了重建国际新秩序的研究之中，遗憾的是抗战结束，内战又接踵而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又取消了政治学专业，《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终未能完成，不得不引以为憾。

#### （四）重振“员吏制度”研究：开创中国现代行政学的研究

钱端升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的目标之一是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实行宪政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他希望战时政府能推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更希望通过一个强有力政府来促进中国

<sup>①</sup> 钱端升：《法国的政治组织·序》，见《法国的政治组织》，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sup>②</sup> 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0—83页。

的法治，促使战后中国政治制度能走向现代化。

政府通常关注公平与效率两大问题，建立强大政府的效率，必须有政策、法制和官员三要素构成。钱端升认为若没有能理解政策并遵守法制的官吏或公务员，则“最优良的政治，充其量也不过是等因奉此的文书政治，或口是心非的宣传政治”<sup>①</sup>。所以官员是政府中最核心的要素，行政学成了他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1931年元月北平的《政治学报》创刊号上就登载了钱端升的一篇讲演稿《英国之员吏制度》，他对 Civil Service 的翻译强调了采用“员吏”一词是将现代“公务员”与传统的“官吏”相结合的更准确的译法。

钱端升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率先在法学院下成立了行政研究室，开启了中国现代行政学研究的先河。经过一年多的资料收集和 research，1937 年钱端升和他的学生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六人合编了《民国政制史》，将辛亥革命以来的民国中央政府及省、县和市的全国行政做了基本梳理。“但亦有从缺者：蒙藏等等制度，以需较专门之研究，未及；前数年共产党在江西等处所采之政制，则以材料难以获得，未及；各实验县，则以略述无意义，细述则占篇幅太多，亦未及。”<sup>②</sup>

1934 年，正在清华读书的龚祥瑞和楼邦彦在钱端升指导下，合著了《欧美员吏制度》，钱端升校对并作序，他认为中国清道光前“员吏”制度优于西方，现在急需追上。因为“第一，工业革命以来，国家所经营的事业日益繁重而复杂，故用旧日方法所取之士，决不能胜今日员吏应有之任。第二，在近代民主国家，行政的监督不复全在行政首领之手，而立法机关——或特设的监察机关——成为行政机关之监督者”<sup>③</sup>。

1939 年秋，钱端升在昆明西南联大恢复设立了行政研究室。其主要职责为：（1）以研究中国现代及过去各种行政问题为目的；（2）由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担任行政部门之各教授与研究助理若干人组织之；（3）研究室主任由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兼任；（4）研究助理员以各大学毕业生中曾任行政研

① 钱端升：《论官等官俸》，《行政研究》第 2 卷第 2 期，1937 年 2 月 5 日，第 97 页。

② 钱端升：《序》，见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③ 钱端升：《序》，见龚祥瑞、楼邦彦合著：《欧美员吏制度》，钱端升校，世界书局 1934 年版。

究工作或对行政研究确有兴趣及能力者充之，其人选由担任研究之教授审核推荐；（5）研究室经费由西南联大担任，并得受各学术机关之补助。1940年西南联大常委会146次会议决定聘请钱端升教授为行政研究室主任，同时聘请周世述、龚祥瑞、戴修瓚、秦瓚为行政研究室委员会委员。

1943年行政研究室刊行了陈体强著的《中国外交行政》，1946年刊行了施养成著的《中国省行政制度》。后来行政研究室还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说钱端升开创并推动了中国现代行政学的研究。

### （五）展望《战后世界之改造》：“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

钱端升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尤其对近代主要国家间的历史有深入的钻研，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他最后的工作单位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外交部顾问。

留美归国后的1925年，他就在《晨报》“七周年增刊”发表《治外法权问题》，强调治外法权已严重影响到国家主权，可谓“罄竹难书”，鉴于英、美、日、法“实为东亚的横暴者”，提议要不直接宣告废除，要不就一起和他们签约废弃。1927年他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收回上海租界的迫切》一文，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象征，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就交还的，应该借助北伐一并将租界收回。

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已侵占东北，准备向华北入侵，欧洲的法西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上台。这时钱端升提出中国的外交出路不能与日本妥协，要尽快建立反日的战线，在互利的情况下，应该同时与美苏保持友好外交，以获支持。

1934年，在他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的八个月中，发表有关抗战的社论几十余篇，痛斥投降派，提升了全民的抗战士气。但当时国内有一派认为对日抗战只有准备好了才可以抵抗。1938年，武汉和广州失守以后，议和声音再次掀浪，但钱端升反对政府准备好了再打的心理及妥协政策，他认为这将有失中国立场和损害中国的民气，国民政府目前只知道物质的建设，而不知民气丧失的重要性。

1938年，他在《新民族》上发表了《论外交根本政策》，认为近百年来

“凡是比较兴荣的、比较稳定的国家，都秉着一个历久可以不生多大变动的基本政策，以应付国际的局面”。他觉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或北伐胜利之后都应该是有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根本外交政策”<sup>①</sup>。外交政策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周边，“我们是太平洋上兼东亚的大国。要争取我们民族应得的地位，并永远维持这地位，我们不能容忍太平洋上或东亚有任何好侵略的强国存在”。所以对于日本，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摧破日本的武力；（二）、待日本人民以宽大，使日本渐成走上民主及和平的途径；（三）、助长国联的权威，使国联成为强有力的制裁机关。”而对旧有的属地，他认为“我们四邻有旧属于我们的许多较小民族，如高丽缅甸之类。我们应要求国联早日成立一个保护弱小民族且给予弱小民族自决权的有效政策，这个政策应适应于全世界”。他认为“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sup>②</sup>

“二战”后的世界如何重新塑造留给了钱端升许多的思考空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地位快速上升，他在1943年共发表了约11篇相关文章，对战后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展望。1943年11月他撰写的《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提倡国际法一元论，希望战后能建立一个超级的世界政府，给予战后世界新组织军事和经济制裁权，以期达到两大目的：一、提倡国际合作；二、建立国际和平及安全。1942年的中国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就把“战后和平问题”列入讨论议题之一，引起热议和讨论。

1949年后，由于政治学被取消，他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转向外交实践。他是一个总想做事的人，视周恩来为知己，或许和1946年周恩来邀请张奚若和他到周公馆商谈国事有关，1949年周恩来举荐他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首任副会长，协助周开展民间外交，他接待过英国前首相艾德礼和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还八次为和平外交出访，也拜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推动了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战略的实施。

#### （六）修订《比较宪法》：愿中国“政治进步、法治昌明”

除了比较政治制度和行政学，宪法学也是钱端升的一个重要学术研究领

①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新民族》第2卷第13期，1938年10月。

②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新民族》第2卷第13期，1938年10月。



域，世界主要大国中的国体与政体均由宪法所约定，政治制度背后是由各国的宪法体系所决定的，所以钱端升的博士论文中对英法美德四国政府的研究自然与各国宪法密切关联。

1925年他就撰写了《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一文，在文中钱端升将当时世界主要14国宪法作了详尽比较，并就行政和立法关系进行分析和预测。1927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宪法学”。1933年他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西班牙的新宪法》，接着1936年又发表了《波兰新宪法》，1937年还发表了《苏联新宪法》等的文章，宪法学成为他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

较知名的是1927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杰教授撰写了《比较宪法》一书，1933年王出任教育部长，1936年《比较宪法》第三版时，王世杰委托钱端升加以修订，于是钱端升增加了不少篇幅并编修，改为王世杰与钱端升合著。清华大学有法学教授曾评价：“证诸钱氏的一生论著，特别是前后撰著的有关宪政的论文，均秉持此种热心肠说冷话的风格，外方内圆，谨严理性，堪称行家的大手笔。不客气地说，1949年后中国大陆同业中出其右者，迄今尚未之见。”<sup>①</sup>

他一直是一位宪政的拥护者，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的剧变及国内政治的发展，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参与讨论宪政话题，包括《宪法初稿评议》《论宪稿中人民代表机关的保守性》《论宪草中的人权章》《宪法草案修正稿评议》《关于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他认为“在理论上，我们本应提倡法治，法治究是近代国家所不可少的元素之一。但我们不主张空喊法治的口号，因为法律贵有信用，如果有法而不能守，则此后便可永失了实行的可能。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第一要着”<sup>②</sup>。

他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希望战时的行政权实施“独裁”，效率优先。

<sup>①</sup> 许章润：《所戒者何——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②</sup> 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

“我的理想如下：我们早日产生一个贤能当道的强有力政府，由他来为人民谋普遍的福利，为国际储雄伟的力量；近则抵制个别国家的侵略，远则保障世界的和平。”他希望战后中国的制度要避免两个极端，“极权国家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人民，更不知有国外的民族，人民只是工具，而外国民族则是奴隶。自由国家只知有个人的自由，而不知有国家的全体，国家〔个人〕遇到危难，个人〔国家〕随之牺牲。我以为战后的新中国必须避免极权国家与自由国家的短处”<sup>①</sup>。

由于钱端升对法治与宪政的深入研究，他主张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现代化，经济制度和社会体制也需现代化，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的前提。钱端升希望中国通过战时行政的独裁与宪政的民主自由相结合，在战后逐步走向宪政民主体制。

1948年他在《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展望了未来，“与目前的黑暗对比，仍然存在着信心和决心，即人民一定要并能够被唤醒起来去建立一个政府，一个会为他们自己经济和社会的提高而工作的政府，并且是他们有能力去控制的政府。这种信心和决心便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真正的乐观主义”<sup>②</sup>。1954年中共中央聘任他和周鲠生担任“五四宪法”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讨论，1982年又被邀请参与“文革”结束后的宪法修订并担任顾问工作。他对宪法学及其政治学的研究是贯穿他一生的学术及实践活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持续走向“政治进步、法治昌明”<sup>③</sup>。

### （七）主办《今日评论》：“一护抗战到底，二筹战后建设”

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都有办刊物的风气。1915年陈独秀的《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1917年《新青年》移师北京后成为白话文的阵地和五四运动的号角。1919年秋陈独秀离开北大南下上海后，1922年5月北京大学的胡适又创办了《努力周报》，专门研究政治、讨论社会，为公开批评、

① 钱端升：《新中国与一党制》，《中央周刊》第4卷第4期，1941年9月4日，第419页。

②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③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改革政治而做准备。

1924年底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世杰和周鲠生等在北京创办了《现代评论》，取代了《新青年》和《努力周报》留下的思想真空，主撰稿人有胡适、高一涵、陈西滢和徐志摩等。1927年《现代评论》编辑部迁移到上海后，钱端升出任主编。1932年5月胡适还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参与，倡导“独立”之精神。“五四”以来的北大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办刊的目的就是利用媒体发表知识界的论点，表达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1938年北大转移到了昆明，钱端升在教书的同时，开始筹划办一本政论刊物，其办刊目的是“一护抗战到底，二筹战后建设”<sup>①</sup>。《今日评论》1939年元月刊行，钱端升任主编，王赣愚和伍启元协助《今日评论》的编辑、行政和财务工作。在两年半中，共出版了5卷114期，刊登了561篇政论。它是抗战期间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之一，撰稿人大约有200位左右。王了一（王力）先生曾评论道：“胡适之先生所主编的《独立评论》和钱端升先生所主编的《今日评论》都是不收稿费的，但是它们所载的文章却不失为第一流。”<sup>②</sup>

钱端升在《今日评论》创刊号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是《统一与一致》，等同准发刊词，为办刊定下基调。他认为抗战中也需要言论自由：

至于中国人民则向来偏向自由，而较能有思想，较多发表意见的读书人，更素来习惯与自由表示意见。言官制度之所以能为中国政治上的最特殊善良的一个传习，士子上书当局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风气，以及历代学潮之所以时起，均足以表示中国读书人向来能自由表示意见，且喜自由表示意见。现在要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做应声虫，不许其自由思想，不许其自由发表意见，事实上决难做到的。将来教育普及，民智愈发达，个个中国人，或差不多个个中国人，成为读书人，则困难自必更大。<sup>③</sup>

① 引自“钱端升日记”，1938年9月14日。

② 王了一：《卖文章》，见《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③ 钱端升：《统一与一致》，《今日评论》创刊号，1939年1月1日，第4—5页。

他坚持国民应畅所欲言，对国事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如果要建设一个强力和廉洁的政府，只有开放舆论才利于监督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一思想凸显了他的学人本色。

1940年6月钱端升在《今日评论》上还发表了《大学往何处去》一文，强调大学教育重点还是要培养“士人”，要和专门教育分开的：

大学的基本目的是求知，而不是实用。如果大学教育能同时发生作用，那是一种副作用，而不是原始目的。专门教育的目的则在养成技术人材，他的原始目的即是实用。两者不应相混。如误会大学教育即专门教育，则研究的精神将荡焉无存，学术的水准也必低落。如果我们不甘长为一个学术落后国家，我们自今以后务须认识大学的使命。一扫过去对与大学的错误观念。真正的大学决不能对于“实”“不实”的科目之间有轻重之分。<sup>①</sup>

总之，《今日评论》是抗战中重要的时评政论刊物之一，对国内宪政问题、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三大问题展开论争，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以此为阵地，为危亡的祖国献计献策。撰稿人包括潘光旦、陈岱孙、朱自清、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罗隆基、王赣愚、费孝通、林徽因、王了一、钱钟书、武启元和吴之椿等。

#### （八）主编《当代西方政治学文选》：期盼早日面世

钱端升对比较政治制度、行政学及宪法学的研究受美国新政治学派的影响，他比较注重现实政治运作的观察和研究，对政治学的现实研究大于哲学探讨，但并不意味他不关注政治思想与哲学。

1931年王云五、何炳松、刘秉麟在主编“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时，邀请钱端升选注四本英文政治学经典名著并撰写四篇编者导言，他选择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霸术》、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布赖

<sup>①</sup> 钱端升：《大学往何处去》，《今日评论》（合刊）第3卷第24号，1940年6月16日，第377页。

斯的《现代民治政体》。

钱端升曾谈到亚里士多德根本的贡献，“第一，他是政治学的始祖。……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虽然和他的《伦理学》紧接，但在他的思想系统中，政治学毕竟已有独立的地位；不但不是伦理学的附庸，而且隐隐然为讨论到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学问或智识伦理学中之政治学必注重于何者为最善的政治生活，但真正的政治学则必须顾到何者为可能的政治生活。”“第二，《政治学》开宗明义就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以明示人类的活动不能离了政治。如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足以使劳工阶级不自馁，使他们能深信将来的世界是他们的，则亚里斯多德的人类政治动物观亦足以使人类益知政治之莫可忽视，而益注意于政治改进之方。”<sup>①</sup>

他还进一步写道：

与《政治学》相关最密者有三书，即《伦理学》《经济学》及《宪法》。《伦理学》讨论个人求完美生活之道，《经济学》讨论家庭求富裕之道，而《政治学》则讨论全社会求生活完美之道。三者中，《经济学》最不重要。《伦理学》及《政治学》为前后相接之书，承上启下，关联极密。凡想贯通亚里斯多德的政治思想者，不能不兼读相关诸书。<sup>②</sup>

马基雅维利是大家熟知的意大利《霸术》（或译《君主论》）作者，并且知道他“只要目的正道，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思想。钱端升介绍马基雅维利时，认为他的“《霸术》只论及为政之术，专为治人者设想，而从不为被治者设想，范围的狭小亦于此可见。但这是不足奇异的。马基亚弗利本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写《霸术》的原因，乃欲以经验及观察之所得，供献于有志统一意大利的雄主，他并不求于政治原理有所立说”<sup>③</sup>。钱端

①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②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③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页。

升的评论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认为“为成功起见，为取得及保持强力起见，则举凡一切合纵连横的雄略，欺世盗名的技术，皆为必须的，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而道德及宗教上的考虑则可以置之度外。只消目的是正当，则手段可以不择：这就是马基亚弗利的教训，而为后世所诟病者”<sup>①</sup>。钱端升解释道：“有人以《霸术》提倡专制而谓马基亚弗利亦信仰专制，此亦莫须有之事。《霸术》论人君治国之法，以君为主，故他主专制；但于论古罗马共和国之《书后》内，则他又显然左袒共和及自由。”<sup>②</sup>

1934年钱端升撰写了《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提倡“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sup>③</sup>。他一生追求宪政、民主和自由理想，当时的思想或许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也体现出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学人本色，他希望在战时通过独裁建立一个强权的法治政府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以拯救国家，战时的政府显然效率需要优先于公平，战后才能侧重于公平，达到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但他的美好愿望在抗战后变成了失望。

钱端升在介绍《法意》时道：“孟德斯鸠之旁征博引，溯古追今，诚深合科学的精神。但孟德斯鸠亦未能完全脱离主观的见解。”他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等三人的方法虽大致相同，虽俱有不足，而孟德斯鸠则已比较的最合科学的精神”<sup>④</sup>。

最后一位是布赖斯，钱端升对《现代民治政体》的述评是其一生治学方法的映照。“治政治学的方法细别之本种类甚多，然大别之则仅两种：一种偏

①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②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③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④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重主观、直觉、抽象、理论、演绎；另一种则偏重客观、事实、归纳。前者我们不妨叫作玄哲的方法，而后者是科学的。”<sup>①</sup>

他继续补充道：“历史学家之责任在讲真正的事实和盘托出，并加以说明；如在写史时先有一种理论存在，则他势必于不知不觉之间偏重利于那种理论的事实。”“自亚里斯多德开其端后，凡马基亚维利、孟德斯鸠，以至布赖斯俱可谓于后者一派，因为他们彼此间的程度虽不同，而在比较方法之同一路上则可以断言。若就四人彼此互比，则布赖斯的方法尤为近似科学的方法。”<sup>②</sup>

钱端升赞成布赖斯所言：“没有信仰，则一事不能成，而希望又实为信仰之所由寄，平民政治在希望未泯以前亦决不会消灭的。”<sup>③</sup> 展示他虽然对战时独裁予以提倡，但对平民政治仍有信仰的期待。

1962年政治学已被取消十年，突然北京政法学院奉国家高等教育部之命，要求钱端升主编高教部的拟定教材《当代西方政治学文选》。接到任务后的钱端升，构想主要从1945年至1965年中西方主要的政治学著作中选取教材素材，为了连贯性，他也选择了1900年至1945年的若干篇，他拟定一个《文选》的提纲，从60多位著名西方学者的书籍中择其要旨，译成中文，汪瑄和杜汝楫参与翻译，邹德慈负责总务，初步定了共11篇、35章、约156个选编，加上每篇、每章、每编，和全书之前的介绍文字，并亲自校阅审定加了编者语，总字数约有150万字（中文），共九卷本。

当全部工作完成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政法学院决定撤离到安徽，为了防止书稿散落，钱端升将其交给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但“文革”结束后，这些书稿就不知下落，至今无法觅得。但笔者相信书稿不会丢失，期望它能早日与学界见面。

①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

②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

③ 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见陈夏红主编：《钱端升全集·第八卷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 二、士人情怀

“士人”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称谓，“士人教育”是中华文化延续的基石，承担着中华文明传承的责任。孔子创立了中国传统的“士人教育”思想。钱端升作为现代“学人”，从事的是“政治学”“行政学”与“宪法学”的专业研究，但他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作为现代“学人”，他仍不乏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也秉持着“知行合一”的士人价值观。

### （一）主张“士人教育”：“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

钱端升作为政治学“学人”和其他学科的“学人”一样，除了教书与研究之外，同样有着“士人”的志向，更何况他的专业是政治学，无疑参与政治生活就是最大的学术观察与实践，这也是他在哈佛大学所学到的治学方法之一。

早在中学时，他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观察现实。晚年他在《南洋中学八十六周年校庆特刊》中回忆道：

到了四年级时，我当了级长。当时各级学校都还没有成立学生会。学生会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才风行起来的。我在三年级那一年即1915年，是全国各地学校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抵制日货极为猛烈的一年。学生们把“五七”（即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那天）、“五九”（即卖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那天）定为国耻日，在街头示威游行，并向市民群众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和亡我灭我的野心。1915年松江中学的同学们象全国各校的同学一样，秉持“读书不忘救国”的宗旨积极进行爱国活动，如上街游行，检查商店的日货，劝告商店不再购进日货等等。

他在清华学堂读书时，同样十分关注国运。五四运动中他对中国政府在



巴黎和会的行为感到沮丧和愤怒，他不仅参加了游行示威，而且被捕，六天后获释。钱端升 1949 年曾回忆道：

三十年前的“五四”，我正在清华高等学堂四年级读书，“五四”运动我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下午的事，我们清华同学五五才进城的，贴标语与北平学生会联系。整个的五月都是在动荡中，五四运动当时在北平有两个高潮，六月三日清华学生全体进城游行宣传，这次被捕的人很多，光清华就有二十多人，被关在北大理科大楼里，后来又一起关到北大法科大楼被监禁的一共有一千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直到八号我们才由清华全体同学迎接回校。<sup>①</sup>

1924 年钱端升回到清华学堂任教。1925 年就写下了《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其中提到“中国今日时局之所以堕落如是者，‘读书之礼’之人太少故也”。“欧洲各国重视士人教育，较美国为甚。在英国操政权者，大都为士人，间亦有大儒；其操行高人一等，故政界绝少鄙污之事。法国亦然，其政客人格亦复大致楚楚可取。”所以他总结道：“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sup>②</sup>

他希望清华未来能够转为“文理大学”，以培养士人。他认为“世界著名各国，俱有最高学府可寻，若法之巴黎，德之哈德堡，英之牛津、剑桥。吾国之北京大学，夫因政局关系，亦不能自称最高学府而无愧。北大如是，其他更不足道；夫以中国之大，而无一最高学府，奈何其可?! 清华无志发展则已，如有之，则当以此为矢，此高程度之文理科所以不可少也”<sup>③</sup>。中国的高等学府需要的是“文理科大学”和“士人教育”的培养，钱端升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一脉相承。

① 柏生：《几个“五四”时代人物的访问记》，《人民日报》1949 年 5 月 4 日。

② 钱端升：《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清华周刊》第 333 期，1925 年 1 月 2 日。

③ 钱端升：《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清华周刊》第 333 期，1925 年 1 月 2 日。

## （二）追随蔡元培：任职国民政府大学院

蔡元培作为近代著名中国教育家，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首任教育总长，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大学院，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其架构和功能模仿法国大学院，废除教育厅，以大学区的大学校长兼管地方教育行政，以“学人”兼教育行政工作，目的是“教育管理”要用学者取代官僚。

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说道：“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与教育为何物也，而专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亲切之遐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及教育之机关也。”<sup>①</sup>

正是在这一理念感召下，曾立下“学者，吾唯一之希望也！”志愿的钱端升于1928年4月加入了蔡元培的民国政府大学院，张奚若和他分任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和文化事业处处长。钱端升的工作是为蔡元培草拟和审查各种草案及部分文件与协助筹备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他曾为蔡元培草拟了《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和《大学院组织法草案》，还有《编译委员会条例草案》《国立编译组织条例》《教科图书审查办法草案》《考试制度委员会草案》《教育行政处组织大纲草案》《中华民国大学院教育行政处办事细则》和《著述委员会条例草案》等。

1928年5月15日南京举办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大学院委员名义参会的有蔡元培、杨铨、金曾澄、许寿裳、朱葆勤、杨芳、张奚若、朱经农、陈剑脩、钱端升等11人。钱端升以高等教育组成员提出《提高学术文艺案》，其要点为：“（1）增加研究高深学术之场所；（2）文艺之提倡；（3）留学生之派遣；（4）奖励关于学术文艺之作品。”

他强调“高深之学术文艺，实为民族性之所寄。无高深之学术文艺，则民族终难以竞存”。当下中国学术的近况“不特以视西方先进各国瞠乎其后，

---

<sup>①</sup>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4页。

即以视新兴之日本亦望尘莫及”。他自己认为“论者谓日本之强盛，基于武功者小，而基于文治者大，确为正理也”<sup>①</sup>。大学院由于改革触动了原有体制的许多利益，钱端升和张奚若六个月后同时离职，但在大学院期间张奚若和钱端升成功地推动了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一年后蔡元培也交棒于蒋梦麟，专职于中央研究院。

张奚若比钱端升长 11 岁，自从在清华成为同事相识后，钱端升视他为兄长，或许他们直率、正直和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和脾气相近，同时都具有理性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张奚若更具有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而且他们都是留美的政治学学人，先是一同在清华教书，后又一起到民国政府大学院任职，再后同赴西南联大执教，战时一同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结束一起被邀请到周公馆探讨国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起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两人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在 1957 年钱端升遭遇不公时，只有张奚若这位老朋友会经常来探望他与之攀谈。

### （三）出任《益世报》主笔：反对与日妥协

1930 年秋钱端升从南京再次回到清华大学执教。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陷落，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当局形成两派意见，南京有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与日“亲善”，钱端升则是一位主战派，这时的钱端升决定走出书斋，继罗隆基之后于 1934 年出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参与时事论政，宣传抗战。

《益世报》1915 年 10 月创刊于天津，由雷鸣远（比利时人）创办并主持。1921—1922 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曾为《益世报》写下了 56 篇海外通讯。《益世报》历来秉持自由主义倾向，在抗战中成为反日侵略和捍卫国家主权舆论方面最激烈的大报，罗隆基、梁实秋、田汉、钱端升、张秀亚、范长江、张恨水和邓广铭等都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

1934 年钱端升于任《益世报》主笔时的八个月中撰写社论 170 余篇，主要内容为对日外交，还涉及国家周边安全、宪政、民生和教育众多话题。他

<sup>①</sup> 钱端升：《提高学术文艺案》，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编纂：《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第 450 页。

极为关注中国边界的动态，撰写了《如何挽救新疆局面》《溥仪称帝前后应有之防范》《藏事不可忽视！》《英兵侵入滇边事件》和《台湾开了对岸会议以后》等社论，防范帝国主义对我边疆的觊觎。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态度采取所谓“亲善”的缓和政策，但日本军部并不满足，侵占东北后，期待华北进一步非军事化。《益世报》与“亲日派”立场截然不同，长城抗战之时，年逾六十的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华北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救护队到河北遵化时，有人请雷鸣远讲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sup>①</sup>

钱端升就对日外交，写下了《“一·二八”两周年又过去矣！》《中日问题果能解决么？》《对日应采何种策略？》《英日间的商战》《二次大战在酝酿中》《长春今日的傀儡戏》《日美关系的转变》《日本之外交策略》《论中日问题告日本人》《华北对日外交的方略》《日本的恐吓政策》《论日本外务省与军部》等几十篇社论，其中4月3日发表的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惹怒了“亲日派”，几个月后钱端升不得不离职。之前的1933年秋，罗隆基也因发表反日言论离职，而且险遭暗杀，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杭州返沪途中被暗杀，一时间保障言论自由成为各大报纸对政府的主要诉求。

钱端升认为无论是“欧美派”的“西向外交”，还是“亲日派”的“东向外交”，中国始终都不能放弃国联，要与美俄保持联系，确立对抗日本侵华的基本外交政策，启动与四国建立盟约。他一直坚持强调解决中日的问题只有“降”与“战”，“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对日抗战，敌强我弱，但不能等到准备好了再战，即使抗战也可能丢失华北、华东、华南，甚至西北与西南，但必须抗战下去。他纵观历史，认为日本同苏联和英美都有矛盾，日本侵华的“胜利”，导致其迟早会同苏联和英美爆发战争，而苏美英又比日强大，中国终将和苏美英一起战胜日本，但需要契机。钱端升的抗日政论文章

① 侯杰、姜海龙：《历史回眸〈益世报〉九十载》，《天津日报》2004年7月10日，转引自田苏苏等：《华北抗日战争史 第1部 从九一八到七七》第4卷（民众抗日救亡），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广受好评，柳亚子赠诗：“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

#### （四）赴美欧宣传抗战：“战而亡、必然可以复国；不战而亡、则可以永远亡国”

钱端升在1937年6月受蒋梦麟和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加强北大法学院的力量，随后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旋即派遣他和胡适、张忠绂三位北大学人赴美欧宣传抗战，开展对国联和美、英、法等大国的工作，促使美欧从舆论和物质上支持中国。

在近一年的民间外交活动中，他们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还访问了美国外交部及内政部。钱端升独自回到哈佛大学，见到了何尔康教授，何尔康“屡问（中国）让步的限度，我告以恐不多，且告以中国是预备抵抗到底的”<sup>①</sup>。后又拜访哈佛大学81岁的老校长洛厄尔，他们都介绍了美国许多要人，希钱端升加以访问。

钱端升和胡适还拜访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The Nation* 主笔、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美国国联同志会会长肖特威尔（James G. Shotwell）。也见到了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辑，在和《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交谈后，《纽约时报》有了批评日本的议论，而不再有非议和怀疑中国抗战的议论。

钱端升独自到纽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发表讲演“中国与中立”（China and Neutrality），听众有三四百人。钱端升和张忠绂还到参议院拜访外事委员会主席皮特曼（Key Pittman）和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德州参议员约翰·莫里斯·谢帕德（John Morris Sheppard），期望推动美国重新思考其所奉行之孤立主义外交政策。1939年7月美国政府高层就开始希望国会实行对日禁运，罗斯福指示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在中立法修改前实施禁运，同年7月罗斯福建议停止卖给日本石油，26日美国宣布废除《日美商约》。

<sup>①</sup> 引自“钱端升日记”，1937年10月。

1937年11月在纽约时，钱端升记有“午电适之，知孟真（傅斯年）、（高）宗武联名，愿请总统调停，但我意见绝不可能”<sup>①</sup>。王世杰、翁文灏和钱端升等一派则认为“抗战到底，必须坚持，不能言和”。因为钱端升始终认为对日抗战“与其不战而亡，毋宁战而亡；战而亡必然可以复国，不战而亡则可以永远亡国”<sup>②</sup>。

接下来，钱端升用25天（11月26日—12月19日）时间走访了美国中西部13个城市去宣传抗战。包括：去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战争的起因”（Origin of the War）；去底特律（Detroit）和红十字会、商人、报纸主笔等见面；赴兰辛（Lansing），访菲律宾前总督弗兰克（Frank Murphy，罗斯福总统的好友），被告知列强会对日示威，但不会行动；去密尔沃基市（Milwaukee）访社会党人丹尼尔（Daniel W. Horn）；赴麦迪逊市（Madison）访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赴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与中国学生开会，探讨宣传抗日的方法和要领，与媒体、杂志主笔探讨，继续和一些商人及媒体主持人接触，希望商人不要卖废铁与日本，以减少对日本军火工业的支持；赴大福克斯市（Grand Forks），在北达科他（North Dakota）州立大学讲“中国政府组织”课，在狮子会（Lions Club）讲“中国的发展1927—1937”（China's Progress 1927-1937），在北达科他大学讲演“在中国的未宣之战”（The Undeclared War in China），讲“战争背后的问题”（Issues Behind the War）；赴第蒙市（Des Moines）与当地主要媒体的主笔、前主笔，以及总编、主编见面，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与决心；赴爱荷华市（Iowa City）见牧师会，但牧师多主和者；去托皮卡市（Topeka Kansas）见了共和党人的州农委的官员，他们只是反总统，一切随民意；到堪萨斯市（Kansas City）访问了当地邮报的主笔和新主笔，多为“孤立派”人士，不甚友好；在圣路易斯（St. Louis）拜访圣路易斯市邮报主笔，他对华态度不错，但告知钱端升他不会有何具体行动；在芝加哥（Chicago）访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卡罗尔，“彼最亲华，彼劝我们须力抗，无论有无国际援助，又劝如

① 引自“钱端升日记”，1937年11月。

② 钱端升晚年回忆起抗战时，叙述他当时对抗战的态度。

(美国妇女选民联盟)一些团体,须往演说”<sup>①</sup>。

回到纽约的钱端升继续开展各种活动。1938年4月奉国民政府之命又只身到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和丹麦拜访各国政要,参加国联会议并发表演讲,宣传抗战,争取国际上舆论和物资支持。在伦敦时他拜访了蒋百里<sup>②</sup>和于斌,他们也是受政府委派到德国和意大利来应对欧洲政局变化的,在伦敦他还和孙科商讨了美、英、苏援助的事宜,也访问了全英援华会,见到王礼锡与熊式一,还同印度领袖尼赫鲁等人见面。在伦敦期间还专门拜会了英国著名学者,工党领袖之一的拉斯基(Laski),寻求英国政府的支持并探听英国各界的态度。

钱端升后又到巴黎和驻法大使顾维钧交流。随后与驻英大使郭复初到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首次会议,会上钱端升提案中国外交部向意大利抗议占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后返回伦敦拜访了英国国联同志会。又再去巴黎访问法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和法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见到曾任越南殖民长的法国高官,钱端升被告知越南的军火通道(云南蒙自到越南河内)不会关闭,闻此他深感欣慰。

1938年7月“国联同志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国际年会,钱端升代表中国出席,提出“对日实行经济制裁”的提案。会后钱端升到柏林,访问了几位德国教授,他们“认为德英难和,虽大家不战,而战亦难免”。钱端升认为“但此种德国不易和平也”<sup>③</sup>。随后,他从法国启程回国,300天的使命总算结束,但全面抗战才是初期,回到武汉述职后,他辞谢了邀他到政府任职的要求,毅然返回昆明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继续任教,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系主任<sup>④</sup>。

钱端升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曾于1939年底和1945年初两次赴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十四国学者、政要研讨战时与战后

① 引自“钱端升日记”,1937年11—12月。

② 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人,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教育家,陆军上将,钱学森岳父。1937年夏撰《国防论》,认为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1937年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访问意大利、德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的基本观念》,阐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③ 引自“钱端升日记”,1938年7月。

④ 当时的西南联大虽已三校合校,但北大、清华和南开仍然保留各自的院系及职务。

问题,钱端升在会上表示战后的日本“不能为(政治)大国,只能为大荷兰,造之为商业国”<sup>①</sup>,提出了他对战后改造日本的设想。

### (五) 议政国民参政会:反贪污、反独裁、争民主

钱端升是研究各国议会委员会的,他对议会的工作程序及功能十分清楚,但未实践过。在他还在美欧宣传抗战的时候,他已被遴选为首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立的民意机关性质的最高咨询机构,当时被遴选还有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傅斯年、杨振声和周炳琳等,延安方面有毛泽东、王明、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和邓颖超7人为参政员,全国总共约200名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1938年7月6日召开时,钱端升还在丹麦参加国联大会,10月28日的第二次会议他已回到重庆出席了。此时广州刚陷落于日寇,抗战形势严峻,但在大会上,钱端升和周炳琳联署42名参政员,提出设立特种委员会,审查贸易委员会及外汇,矛头指向孔祥熙。傅斯年也认为:“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憚。2.他之行为,堕人心,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他一向主张投降,比汪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sup>②</sup>但驻美大使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因为他此时受到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双面夹击,蒋介石袒护孔祥熙,尽管如此,傅斯年和钱端升还是上书要求弹劾孔祥熙。

果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这笔巨额借款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孔祥熙与财政部决定以3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美金债券的发行中,孔祥熙扣留了未售的5000万美金公债,然后用空头支票分期分批地将5000万美金全部鲸吞,再以黑市价格售出,孔祥熙在没有支付一文法币

<sup>①</sup> 引自“钱端升日记”,1939年11月。

<sup>②</sup> 《傅斯年致胡适》,1940年8月14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9页。



的情况下获暴利达 115 亿法币之巨。如此巨贪，在傅斯年和钱端升等参政员的弹劾下，孔祥熙不得不离职到美国去做寓公。

此次参政会上，钱端升、于斌和周鲠生被选为第二组国际外交召集人，委员共 25 人，吴玉章等人的《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友邦人士，敦促各该国政府，对日寇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案》获得重视。钱端升同时出任国民参政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一职，足见他对战时外交的研究和影响力。

全面抗战胜利后，钱端升及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认为国民政府应该还权于民，实施政治改革。在 1945 年 7 月的第四届参政会上钱端升再度提出与上次大会相同的提案《再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钱端升和周炳琳还提出由特种审查委员会组织“政治解决委员会”，希望邀请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各一人参加，再以无党派、公正人士三人共同来协商政治解决的途径。

1945 年 7 月 20 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钱端升和周炳琳意见书。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意见，有若干点，端升、炳琳未能与多数一致，谨列举如下：并请提出大会作为委员会之少数报告。一、国民大会召集之日期先后为次要问题。首次国民大会之职权，限于制宪抑兼行宪亦为次要之点，在代表人选必依立宪国家通例由普选产生。在普选有可能以前，国民大会如须召集，关于大会召集有争执之问题，各方须从协议先求解决，求大会勉能反映广遍之民意。二、协议可采取设置政治解决委员会之方式。在实际政治上，关于国民大会召集之争执与其他政治争执彼此牵连，不能分离。为便于前一种争执之解决起见，政治解决委员会应对一切政治争执均有讨论协议之权。三、无论国民大会何时召集，如何召集，人民身体自由言论自由及政治结社自由，政府务须立即作最确切最有效之保障。钱端升，周炳琳。<sup>①</sup>

<sup>①</sup> 钱端升、周炳琳：《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审查意见的声明》，1945 年 7 月 1 日，见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82 页。

1945年10月1日钱端升与张奚若等十位西南联大教授致电蒋介石、毛泽东，电文题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毛电文》，公开信呼吁国共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1945年11月25日钱端升在西南联大讲演《中国政治之认识》，“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之必要。谓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制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sup>①</sup>。直至1948年钱端升赴哈佛讲学之前仍在奉劝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共同努力于世界和平和中国的战后重建。

#### （六）参与成立“外交学会”：拓展新中国的民间外交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宣布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由于钱端升长期研究关注中国的近现代外交事务，因此，新政权在起草《公告》的外交政策部分时征询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需明确向全世界表达：“必须团结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1949年12月15日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钱端升是29名发起人之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周恩来任名誉会长，张奚若任会长，钱端升等任副会长。之后，钱端升以此身份参与了新中国大量的民间外交活动，如1954年8月钱端升全程接待陪同英国前首相艾德礼及工党总书记菲利普斯率工党代表团访华，双方探讨了如何改善中英关系，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从而促进了中英友谊，启动了通商贸易。1955年11月钱端升还接待并全程陪同日本社会党领袖、前首相片山哲率领的全日本保护宪法联盟代表团，最后双方发表声明表示要共同促进中日早日恢复邦交，此次外事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均亲自出面接见了代表团。

1956年7月26日钱端升奉周恩来之命，独自乘飞机经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蒙特利尔于8月2日到达加拿大的帕格瓦施，参加由美国大资本家伊

<sup>①</sup> 《钱端升教授呼吁成立联合政府》，《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9日。

顿（Cyrus S. Eaton）邀请各国学者参加的国际问题讨论会，出席的学者分别来自加拿大、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西德）、伊拉克、以色列、苏联、美国和联合国组织。主办方伊顿先生希望通过讨论会来接触和了解新中国，钱端升在会上介绍了新中国国家制度与和平外交政策，期间，吴大猷夫妇还专程自渥太华来和老朋友钱端升见面。这次出访或许是自王炳南从1954年6月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官方外交谈判以来，中美民间的首次外交接触。

除上述外，他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多次新中国的对外友好和交流活动。如1950年10月参加郭沫若率团的华沙世界和平大会，团员有廖承志、钱俊瑞等，在波兰期间他还参加了国际民主法学工作者理事会。1951年3月参与外交学会派出的科联代表团访英。1954年12月由他率团出席印度第42届科学大会及巴基斯坦科学协会第7届年会，团员有我国知名科学家侯德榜、狄超白、汪胡楨、薛愚等人，在印度期间他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1955年6月他又到芬兰赫尔辛基参加了各国议会联盟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同时与日本、印度、美国的同行一道参加了法律工作者协会会议，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6年1月出席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争取缓和世界和平及裁军会议。1956年3月他以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的身份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1957年5月又去锡兰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总的看来，50年代的上半叶，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活动占去了他很多时间。

### （七）投身政法建设：追求法制中国

钱端升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受列强的欺凌，强加给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特别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更使中国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军阀仍混战不断，尔后又又是日本侵略中国，在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反击下，中国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后，中国又打了三年内战，但最后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而且就在当年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是。为此，他满怀激情地著文评价新政协会议“划了一个时代”，“继往而开来”。

他对新政协会议期间，对为国牺牲的先烈们而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与赞赏，他认为所纪念的人物“尽管各人的革命意识在一零

九年中有种种的参差。这对于逝者的兼容并包也表示了承继过去百余年革命的意义”<sup>①</sup>。此刻，他对新中国的建立充满了热忱与希望，他曾表述道：“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所需要我做的工作。”<sup>②</sup>

1949年钱端升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参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其中就有他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表述的意见。董必武在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中提到：“起草委员会开会三次，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的意见，写成了的草案初稿。”<sup>③</sup>

1952年他曾写道：“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我怕担任任何工作，只想用功读书”，后经过张奚若和吴晗的动员，“我承担了一些学校的、专业学会的、人民团体的和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些工作”<sup>④</sup>。包括出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因此他要参加政务院、教育部、教育工会、北京市政府等多方面的会议，以及接待和出访的公务，使他根本无暇钻研学术。

在所担负的社会工作中，对他来说最有意义应该的是1954年他和周鲠生一起被聘请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顾问，参与新中国首部宪法的制定。其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以及第三章，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与田家英、李维汉、陈叔通、刘少奇和毛泽东等都有互动。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采取民主集中制，中央政府掌握有大的权力，快速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同时百姓能够享受到宪法赋予的基本自由权利，让每个阶层公民都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建设国家，重要的是完善中国的法制建设，推动中国成为富裕、繁荣、进步与强盛的大国。

① 钱端升：《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591页。

②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

③ 《董必武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的基本经过及内容》，《人民日报》1949年9月23日。

④ 钱端升：《共产党教育了我》，《光明日报》1952年7月1日。

## （八）寄语新政治学：提倡“首创精神”

回到北京大学后，钱端升就开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比较政府）等课程，新政治学正在探索之中。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急需培养新的政法人才，全国高校体制开始转向学习苏联模式，实施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四校的政治系、法律系及社会学等学科合并，于原北大红楼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两年后转迁至蓟门桥新建校区，北京大学则迁往原燕京大学校园。随后中央教育部开始对各学科进行课程改造，钱端升出任全国课程改造政治系组组长，经过若干次的讨论未果，决定向苏联看齐，政治学和社会学还是被取消了，这个决定对于一生研究政治学的钱端升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文革”结束后，政治学得以恢复。1981年，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钱端升在谈到苏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落后于世界并对外侵略的问题时，提出苏联哲学社科的落后“同它实行的政治制度、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僵化，压制民主，以及它的一套行政管理制度和干部制度等等，究竟有没有关系，同苏联在政治学方面的落后状况，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sup>①</sup>。

实际上1949年9月18日在北京就成立了“新政治学筹备会”，周恩来参与并出席了筹备会，林伯渠担任筹备会主任，其目的是在新时期“研究中国社会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和政治制度”<sup>②</sup>。钱端升作为参与者之一，很早就思考着中国“新政治学”的未来。

钱端升教授希望新中国的法学、政治学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学科，学术水平不能输于欧美。所以他渴望北京政法学院的目标就是要比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王铁崖先生也希望能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来研究国家的外交政策，楼邦彦先生也希望建立一个“大法学研究所”来研究中国的法制体系，结果这些宏伟的学科与科研计划在1957年都被当成罪状，使三位先生受到批

<sup>①</sup> 钱端升：《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见中国政治学会《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编：《政治与政治科学》，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sup>②</sup> 《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平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9月20日。

判。其后，国家逐渐走向“人治”体制，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改革开放以后，钱端升再次呼吁要大力提倡对政治学的研究，“无论对于政治学的内容、科研、教学等哪个方面，我个人认为：都应该提倡首创精神，采取一些新的方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sup>①</sup>。

1982年北京大学恢复了政治学专业，1983年开始了政治学本科的专业招生。赵宝煦教授作为新时期政治学的领军人物曾先后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及哈佛大学访问交流，钱端升也将哈佛大学著名的费正清教授，以及当年自己在哈佛大学讲学时的助教——时任加州大学教授的斯卡拉皮诺引见给王铁崖教授和赵宝煦教授，期盼中国政治学在今后的世界学术舞台上能占有一席之地。

### 三、结语

钱端升一生与政治学结缘，他在所研究的比较政治制度、宪法学、行政学与国际关系等领域都出版了许多专著，他和他的同仁们也构建了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框架，无论从政治学专业在大学的设立，到课程的开设，再到对中国自身国家问题的研究，他们这一辈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一切都展示了他的学人本色，而他也从未忘记士人的职责。

早年钱端升所主张建立起一个“强力政府”的设想在新中国实现了；他所期盼的在中国大地上结束战乱，创建一个独立、统一和强盛国家的愿望也在新中国实现了；他所追求建设“法制中国”的目标也在改革开放后日臻完善了；但他毕其一生持续推动中国政治体制不断走向“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最终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理想，依然还任重而道远。

2020年2月25日于北京仰山斋

---

<sup>①</sup> 钱端升：《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见中国政治学会《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编：《政治与政治科学》，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